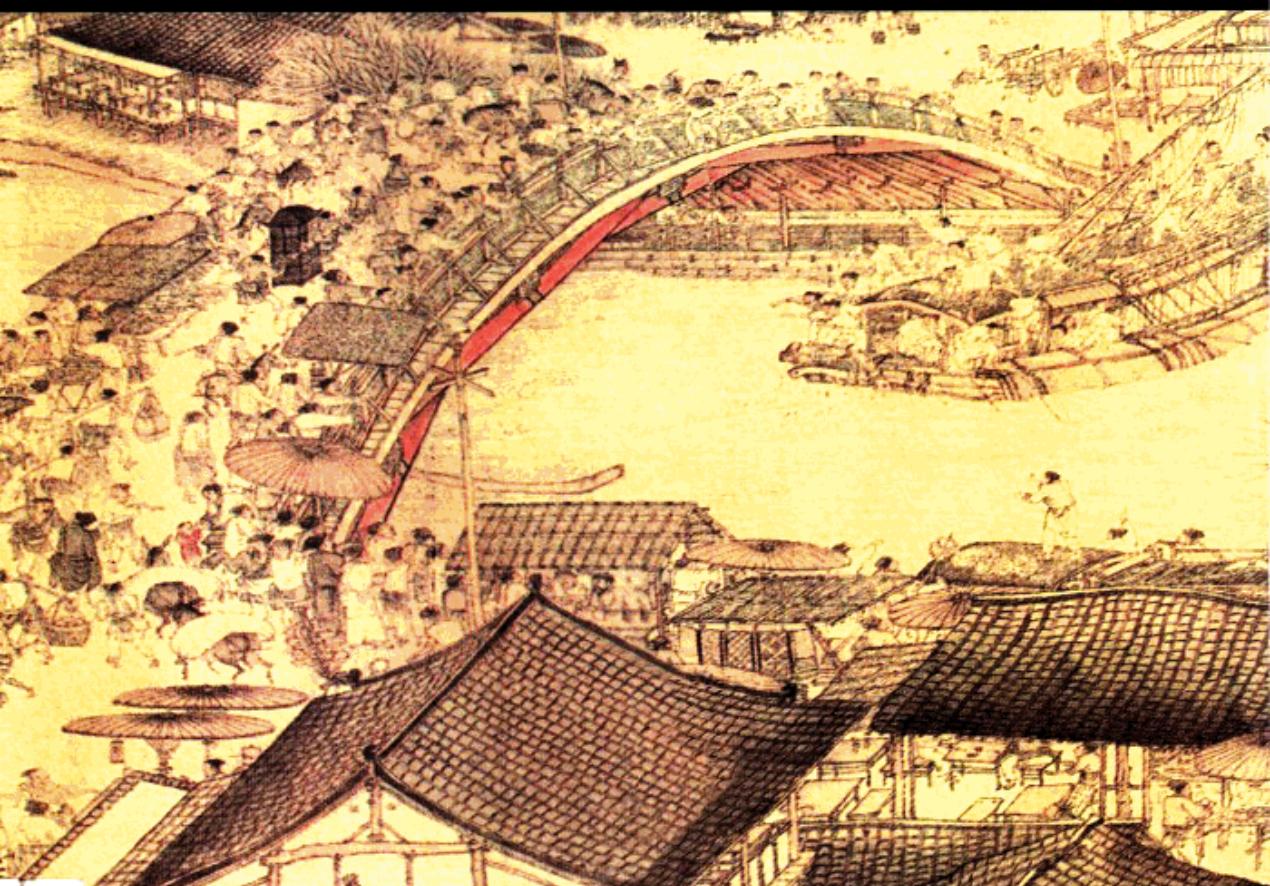


开封考古 发现与研究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 编

主编 丘 刚 副主编 李合群 刘春迎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Kaifeng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序

开封是一座蜚声中外的历史名都，也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据《竹书纪年》等史料记载，传说中的夏都老丘，就在开封附近。另外，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金代后期都曾在此建都，因而开封素有“七朝故都”之称。特别是北宋时期，经过九帝 168 年的大力营建，使开封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开封地上地下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然而由于金明昌年间黄河的改道，开封不断受到泛滥的黄河的侵袭，使这座大都会多次遭到“灭顶之灾”，加之战乱频繁，更加速了城市的毁坏。如今，除了开宝寺塔（俗称铁塔）、兴慈塔（俗称繁塔）、延庆观的玉皇阁等建筑因地势较高而躲过劫难以外，大部分重要古迹都已淤没在数米乃至十余米深的地下。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初，开封的城市考古始终是一个空白点。长期以来，人们只能通过文献来追忆开封昔日的繁华，而古人对其千差万别的描述，又造成了史学界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诸多争议。

1981 年春，随着开封龙亭前潘家湖底淤泥下宋明遗址的发现，开封城市考古的帷幕拉开了。十几年来，开封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艰辛努力，克服了开封一带淤沙堆积厚、地下水位高、遗址埋藏深等不利因素，相继钻探发掘了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皇城、古州桥、金明池、启（开）封故城等重要遗址，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段缺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外，他们还与郑州大学考古系合作，先后发掘了开封一带的鹿台岗、朱岗、椅圈马等重要遗址，解决了豫东地区考古学上的一些学术课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封的考古工作者还经过长期摸索，初步创造出利用机械钻机与手工探铲相结合的钻探方式，摸索出了黄泛区考古的新路子，丰富了我国考古勘探的技术类型。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80 年代以来开封的考古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缩影。回顾、总结这段历程，不仅对进一步做好开封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分必要，而且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科学发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的出版。该书总结了十几年来开封考古的成果，向读者展示了开封自原始社会至明代几千年间的历史和地层结构，并逐步揭开了开封地下“城套城”、“城摞城”的奇特现象，使对开封古史的研究，第一次从文献走向实体。在祝贺该书出版的同时，我也预祝今后开封文物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旧城改造的步伐日益加快，这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又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空前难得的工作机

遇。多年的实践证明,做好城市考古工作的关键点,一是要由文物部门参与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批;二是文物考古研究单位要有长远的、宏观的学术眼光,通过逐步积累资料,争取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开封的城市考古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收获,我衷心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取得更多收获。

是为序。

张文彬

1998年10月于北京红楼

目 录

序	张文彬(1)
开封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丘 刚(1)
河南尉氏县椅圈马遗址发掘简报	
李 锋 陈朝云 匡 瑰 张国硕 丘 刚 许俊萍 王小秋(9)	
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	宋豫秦 丘 刚 许俊萍 李合群(24)
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	宋豫秦 丘 刚 刘春迎 魏兴涛(52)
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	
张国硕 匡 瑰 宋豫秦 丘 刚 李 锋 许俊萍 魏兴涛(85)	
试析鹿台岗遗址Ⅰ、Ⅱ号遗迹的性质	刘春迎(97)
浅谈开封地区的早期考古学文化	刘春迎(103)
开封地区夏商文化探索	李合群(112)
启(开)封故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丘 刚(115)
启(开)封故城的兴废与勘探	丘 刚(120)
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李合群 张武军(126)
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丘 刚 孙新民(134)
北宋东京外城的城墙和城门	丘 刚(143)
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	孙新民(149)
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	丘 刚(156)
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丘 刚 董 祥(163)
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	丘 刚(173)
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	丘 刚(179)
北宋东京皇宫二城考略	李合群(186)
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	李克修 董祥(189)
北宋东京金明池的营建布局与初步勘探	李合群(194)
宋东京城遗址内蔡河故道的初步勘探	刘春迎(197)
杞县陈子岗宋代郑绪墓调查报告	李合群 周清怀(205)
开封县出土明代罗山王墓志	李合群(209)
开封历史上的别名、城(遗)址及其特征	刘顺安(211)

Sh30-2型工程地质钻机在开封市考古钻探中的运用	刘春迎(221)
电探考古新技术在宋东京城考古中的应用	张寅生(230)
后记	(236)

开封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丘 刚

开封,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座著名古都,国务院首批颁布的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开封地上地下拥有极为丰富的文物资源。目前,开封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95处,其中国家级5处,省级17处,市、县级173处,这些极其珍贵的人文资源也使开封跻身于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物大市之列。

开封又名汴梁,历史上又有过启封、大梁、浚仪、东京、祥符等名称。战国时期的魏(公元前361~前225年),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年),北宋(960~1127年)以及金代后期(1214~1233年),都曾在此建都,因而素有“七朝都会”之称。此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之一——老丘,传说就在开封附近。元代末年发生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开封也一度作为红巾军的首都。因而,开封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安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古都。

然而,历代兵火使这座昔日气势恢宏的繁华都城残破凋零,滔滔黄河水更使其数次被淹,最后淤没于地下数米之深,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地下“城摞城、城套城”的奇特景观。

由于黄河水患加之兵燹,长期以来开封一直被视为无古可考和有古难觅之地。主要表现在:一是淤沙堆积厚。据测,仅明清两代的淤沙堆积就厚达5~6米;二是遗址埋藏深。如北宋文化层距地表深达8~11米,其上还覆盖有金元文化层、明代文化层、清代文化层和黄河淤沙,其下则叠压有唐汴州城、魏大梁城等文化堆积;三是地下水位高。在开封市区大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在1~1.5米之间,部分区域距地表0.8米就开始出水。这三大困难一直严重制约开封考古工作的展开。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座著名古都的研究只能局限在史籍上。

1981年春,人们在开封旧城区东北隅的龙亭东湖(潘湖)湖底淤泥清理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宋皇宫和明周王府的部分遗迹,从而揭开了开封考古的帷幕。开封文物工作队(原开封宋城考古队)在国家和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0余年的艰辛努力,相继调查、勘探发掘了北宋东京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和城门以及古州桥、明周王府、杞县鹿台岗、朱岗、牛角岗、尉氏椅圈马、杞县许村岗汉墓、启(开)封故城、汴河、蔡河、御街、金明池等大批重要古遗址,以大量实物向人们展示了开封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明清近8000年的

历史,对于了解开封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特别是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探发掘,意义之重大,更使对北宋东京的研究第一次从文献走向实体,并使中原一带广为流传的“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的民谚得以最终证实。

上古时期,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处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平坦,气候温和,而且河湖密布,水道四达,很适应农业和交通的发展。考古工作者曾在开封周围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在开封城南的尉氏兴隆岗采集到了裴李岗时期典型特征的石磨盘和石器等,距今已有 7000~8000 年^①。表明这里曾是先民最早活动、生存、繁衍的地方之一。这种比较优越的自然环境,无疑对以后开封城市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填补开封早期历史的空白,1989~1992 年,开封文物工作队(当时称“开封宋城考古队”)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合作,先后对开封所属的杞县断岗、牛角岗、鹿台岗、朱岗和尉氏椅圈马等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相继发现了一批距今 5000~3000 年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早晚商文化以及东周时期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开创了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夏商周考古的先河。开封城南尉氏椅圈马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该文化遗存与大河村、大司空村、大汶口等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遗址是第一次在豫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②。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发掘表明:夏、商、夷三族曾在这里有过并存时期,开封城东南一带应是夏代的夏、商、夷三族及其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交汇地域^③。而杞县断岗、朱岗、牛角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把主要分布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向东推进,从而为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性质、编年、分期等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的 400 余年间,夏代的都城曾多次迁徙。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禹都阳城……帝宁(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这里所说的老丘,就在今开封城东北的近郊范围内。另据《竹书纪年》引《春秋地名考》:“老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陈留城北”。又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老丘邑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北,相传夏帝宁所都。”有人根据有关史料推测,夏都老丘遗址约在开封东北约 20 华里的国都里村附近^④,相传“国都里”的村名也是因夏代都城设在此地才相沿而来。同时,在杞县境内发现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来看,开封一带最少在夏代晚期,已属于夏的版图^⑤。

1995 年春,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派出“老丘”遗址考古调查小分队,开始在“国都里”村附近数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了勘探,以期发现老丘遗址的蛛丝马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这里属黄泛区,虽然在此发现了一些春秋至汉代时期的陶片和古墓葬,但尚未发现老丘遗址的踪迹。看来,在厚厚的黄河淤泥下寻找其踪迹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开封的建城历史,可追溯到 2700 年前的春秋郑庄公(前 743~前 701 年)时期。这时的东周王室日渐衰微,列国争霸。作为周平王卿士的郑庄公,国富民强,雄心勃勃。而开封一带地处中原,为兵家所必争,郑庄公就在郑国的东北边陲地带修筑城堡,取“启拓封疆”之意而名“启封”^⑥。

郑庄公所以选中这里屯兵筑城,是由于该地东南与宋、陈、蔡接壤,北与卫国毗邻,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又可向诸侯炫耀武力,以便进一步兼并诸侯而称霸中原。从《史记》、《资治通鉴》记载来看,战国至秦末启封城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战役^⑦。到了汉初,因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封为开封,“开封”的名称便由此而来。该城前后延续了1000余年,唐延和元年(712年),其治所移至汴州(今开封市),故城渐废。但启封城的准确位置,史学界始终没有定论。

为了搞清启封故址,1986~1987年,文物工作队在开封附近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勘探。现已探明,这座距今1000余年的军事重镇,就沉睡在开封城南约25公里的朱仙镇附近的古城村。故城遗址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不规整的梯形,城墙周长3300米左右。由于屡次黄河泛滥和战火侵袭,故城的东、南、北三墙都已淤没在地下数米之深,只有西墙的部分地段保留在地面上。至今残墙高约6米,宽30余米,夯筑城墙时留下的夯层、夯窝和柱洞仍清晰可见。地表还遗留着大量战国——唐代的陶片。经探测,整个城址是自西向东逐渐由高向低倾斜,较大的城址落差说明2700年前的启封一带可能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与如今一马平川的淤沙平原的地貌有较大的差异。从对城址的发掘和对城墙的解剖情况推断,故城的城墙夯筑方法,与郑州二里岗商城的城墙夯筑方法十分接近。另外,从故城西南角的老谭寨村发现的一块北魏墓志砖,除对确定故城遗址为启封故城外,对于研究古代的中原望族——郑氏家族的起源和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⑧。

战国时期,是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为避强秦侵扰,继而向中原发展大业,促使魏惠王于公元前361年(一说前339年)^⑨将魏国国都由山西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开封)。经过魏惠王、魏襄王等六代国君的统治,大梁城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代名城。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围大梁久攻不下,乃决鸿沟水灌城,城毁魏降。然而,由于大梁城被深深淤埋于今开封城下的10余米深,考古工作者迄今尚未发现它的踪迹。

汉代,对开封来说,是一个长期衰败不振的时期。由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在水患兵火中化为废墟,以致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一蹶不振,降为普通郡县——浚仪,开封走完了它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进入了长期的衰落期。汉武帝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专程来到此地,面对残破凋零的大梁城遗址感慨万分,叹之谓“大梁之墟”。

然而,在开封东南的杞县竹林乡许村岗村,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的一座形制独特的大型汉代木椁墓,颇有学术研究价值。

1996~1997年,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杞县文管所的配合下,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科学发掘。墓葬系一座“甲”字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坑内砌一周北宽南窄的石墙作为墓室,南北向,平面呈“凸”字形,面积200余平方米,墓室底部亦铺以石块,四周石墙保存完好。其南墙中间有一处石门,用巨石板封墙。墓室分为前后两室,前室放置随葬品,象征“前堂”,后室为棺椁室,象征“后寝”。该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了一批玉器、铁器、青铜器和精美的漆画。从墓室结构、随葬品等分析,该墓属西汉晚期。传统史学观点认为,源于商周时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到西汉中期,在中原地区已普遍为砖石墓、洞室墓所取代,只在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一直延续到东汉。而地处中原地带的许村岗汉墓的发掘,使我们对土坑竖穴木椁墓在汉代延续的时间及区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该墓外围以石墙的墓室结构,在我国目前所发掘的汉墓中尚属首次发现。

步入唐代，开封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随着隋炀帝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北方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而大运河的中段，就是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河。开封位于汴河要冲，又是隋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门户。得此良机，城市迅速发展，因而汴州一跃变成日益繁华的“水陆大都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求，使南北朝遗留下来的汴州城已远远不能满足形势上的需要。唐建中二年（781年），驻守在此地的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对汴州城进行了扩建（一说“重筑”）^⑩。

根据《北道刊误志》等文献记载，扩建后的汴州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城门7座，面积较现存的开封城墙略小。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现存开封明清城墙东西墙的缺口处的勘探和对宋东京内城北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宋内城城墙下发现了唐汴州城遗址。残墙距地表深10~12米，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厚约30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约10厘米的碎砖瓦层，砖瓦残片均属唐代或更早的遗物，因而推测该墙基即为唐汴州城遗址^⑪。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时期。而这五个朝代，就有四个建都于开封城，从而使开封在大梁城被水淹城毁1100年以后，再次由州郡变为国都，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城市地位大大提高。特别是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下诏在汴州城四周修筑外城，并征集开封周围诸县的民夫10余万进行这一巨大工程^⑫。由于开封一带土质松软不易筑城，所以，又从百里之外的郑州虎牢关取土筑之^⑬，修筑时间花费4年，其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面积较旧城扩大了一倍以上。

为了搞清城墙的建筑材料和结构，80年代中期，考古队对保留较好的外城西墙南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城墙系夯土版筑而成，夯土结构坚实，夯窝密集匀称。夯土由红褐沙土和灰黄粘土两种土质交混夯筑。经推测分析，红褐沙土应为挖护城壕或河道取出的本地土，而灰黄粘土则极有可能是从百里之外的郑州虎牢关运来的。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城北20余公里的陈桥驿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并定都开封。经过北宋九帝168年的大力营建，使开封不仅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而且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封历史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北宋东京城共分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墙，形成了层层套叠的国际大都会的宏大气势。

外城，又称新城、罗城，是京师防御的第一道屏障。由于开封地处平原，地势坦荡，无山峦天险可守，因而北宋政权除派40万重兵驻守外，又在后周外城基础上多次加以修葺和扩建。经过多次修葺的外城坚壮雄伟，令人叹为观止。而历代的水患兵燹，使昔日巍峨壮观的外城遭到了极大破坏，并全部淤埋于地下2~8米深。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外城的形制、轮廓、范围及主要城门的位置已基本清楚。经实测，整个外城呈一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四墙全长29120米，合今29公里左右，折合宋里约50里左右，与《宋史》等文献记载的外城周长大致吻合^⑭。

在考古勘探的基础上，我们对地下保存较好的外城西墙南段进行了发掘。发现城墙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其底宽34.2米，顶部残宽4米，残高近9米，版筑的城墙异常坚硬。

由此看来,当时的外城确实是一座气势非凡,坚固雄伟的军事堡垒。

后周的外城共有 10 座城门,及至北宋时期已增至 14 座,水门 7 座^⑤。目前已勘探出 10 余座,多为直门两重或屈曲开门的瓮城门。尤其是西墙正门——新郑门遗址,其东西 120 米,南北 165 米,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内城,又称里城、旧城或阙城,根据文献记载,内城是在唐汴州城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勘探发掘表明,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东西墙下面,分别叠压着北宋内城的东西墙遗址。

由于内城遗址埋藏较深(经测,内城南北墙残墙距地表 10~12 米深),且处于旧城区,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和纵横交错的街道使内城的考古工作十分困难。然经过大量工作,迄今内城的位置、形制、范围和部分门址已基本探明。整个内城略呈正方形,其南墙位于今城南墙北约 300 米的东西一线,北墙位于龙亭大殿北约 500 米的东西一线,内城的东西墙叠压在今城东西墙下面,四墙总长 11550 米左右,折合宋里 20.63 里左右,与文献记载的“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大致吻合,其面积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略小。

皇城,又称宫城或大内。在北宋东京城中央略偏西北处,即今潘杨湖一带,便是北宋皇城。1981 年 5 月,人们就是在清理潘湖(龙亭东湖)湖底淤泥时,发现了宋明时期的遗迹,从而拉开了宋城考古的帷幕,开封的考古工作也自此展开。

时迁势易,沧海桑田,昔日富丽堂皇、巍峨壮观的宫阙早已深深淤没于地下。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摸清了宋皇城的大致形制和范围。经实测,皇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四墙总长 2500 米左右,与《宋史》等文献“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周回五里”的记载大致吻合。皇城共辟有六门,宣德门是皇宫正门,高大雄伟,威严壮丽,因是一高大门楼,亦称宣德楼。80 年代中期,考古队在配合宋都一条街建设工程的文物勘探中,分别在皇城前发现两座门址。一处为午朝门石狮子处探明的宽约 30 米缺口,一处是南距午朝门 400 米左右的早期门址。该门址东西宽约 70 米,南北长约 50 米,因门址位于交通要道,加上勘探工具所限,早期门址的详细情况未能搞清。我们初步推测,如果宣德门在皇宫前作为一种阙的形式存在,南面的早期门址就应是宣德门遗址;如果作为一座门址来看,就应是午朝门处的缺口。究竟哪一处为宣德门遗址,有待于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

北宋东京城的三道城墙中,皇城是唯一采用砖砌的城墙^⑥,在对皇城北墙东段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御街,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是皇帝祭祖、举行南郊大礼和出宫游幸而往返的主要道路,亦称天街、御路或端礼街。从考古已发现的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内城正南门——朱雀门、古州桥、宣德门遗址以及昔日宋皇宫范围内的龙亭,五者连接起来,恰巧与今开封旧城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相重叠,只是叠压在中山路路面下约 8 米深。这表明自北宋以来的千余年中,开封虽饱受兵灾水患,但城市的中轴线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汴河,是流经东京城的第一大河流。汴河即隋炀帝时所开的通济渠,其上引黄河水,下通淮河,是北宋王朝的一条生命线。迄今为止,考古队已探明了外城汴河西水门至御街上的古州桥之间约 4000 米的地段。已知汴河深约 12~14 米,宽约 20 余米。同时,已初步探明外城汴河东水门、西水门、内城汴河西角子门和古州桥等重要遗址。

州桥,宋代称“天汉桥”,是宋代御街与汴河交汇处的一座著名桥梁。1984年秋,考古队在配合中山路中段的市政地下管网改造工程中探出。现已探明州桥桥面距地表深约4.3米,为砖石结构的拱型桥。其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经初步论证,其上部青砖具有明代特征。根据地层判断和有关史料记载^⑩,应属明代所造。其下部石桥墩及河底铺砌则符合宋代营造法式,应是宋代桥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封遭受黄河特大水患,州桥被深深淤没于地下,距今已有350余年。由于州桥地处御街,桥的宽度大于长度,达30米。如此宽广的桥梁,在中国古代建桥史上是较为少见的。这一发现对于确定该段御街的宽度以及研究东京城的城市布局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座标。特别是在州桥底部发现的木质笺基,比在此以前发现最早的南宋福建泉州金鸡桥的木质笺基,还要早一个历史阶段,从而把我国古代桥梁使用该技术的时间提前到北宋时期。

蔡河,又称惠民河、闵河,是北宋时期流经东京城的第二大河流。“自陈蔡由西南戴龙门入京城缭绕,自东南陈州门出”^⑪,横贯整个京城的南部。近年来,在配合旧城改造工程的文物勘探中,考古工作者在旧城区南部的中山路中段至迎宾路中段之间的东西线上,探明了蔡河故道的一段遗迹。得知蔡河河底淤泥距地表约11.5米,呈黑灰色,淤泥中包含有大量的蚌壳、螺壳及少量的颗粒状砖瓦等物,河床宽近20米,探明长度约800米。另外,北宋时期,蔡河横过御街处的著名桥梁——龙津桥,在探明的蔡河部分地段正与御街相毗邻,故亦为今后龙津桥遗址准确位置的测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60年)。它是在战国时期的“灵沼”基础上,北宋皇帝诏令3万余人开凿,历经7年修成。因其水系金水河注入,故称“金明池”。其周围“九里十三步,池面直径七里许”^⑫。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宋人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对其均有生动的记载和描绘。据记载,金明池北的修船大澳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船坞的记载^⑬。

1994~1995年,考古队参照有关文献,两次对金明池遗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勘探,基本上摸清了其位置、形制和范围,并初步探出池南岸的临水殿遗址。据实测,金明池东岸位于东京外城西墙之西近300米处,池为南北向,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240米,南北宽约1230米,周长约4940米,与史载的“方圆九里十三步”大致吻合。池底淤泥距地表深12.5~13.5米,厚度0.4~0.7米。淤泥内含有大量小蚌壳和少量白瓷片、腐草及蓝砖颗粒等。临水殿在北宋时为皇帝“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之地,考古勘探出的殿残基长约40米,宽20米,深约9米。另外,史书记载的金明池与琼林苑之间的大道亦被探出,实测路宽约25米,深约7.5米,路上较硬,层次分明。

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大举南侵。次年春,在开封定都达168年之久的北宋王朝灭亡,开封改称汴京。金主完颜亮为入侵南宋,并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将开封作为金朝的陪都,就在宋皇宫的基础上扩建了金皇宫,扩建后的金宫为“九里十三步”。后完颜亮兵败被杀,金宫废弃。金贞祐二年(1214年),金被元军所迫,将国都由燕京(今北京)迁至开封,并仍以此地为皇宫。金天兴元年(1234年)金亡,汴故宫遂废。

为探讨宋金城墙的叠压关系和城墙结构。考古队选择了宋内城北墙西段开挖了一探方。发掘结果表明:在北宋内城上叠压有金皇宫城墙。城墙系由夯土版筑而成,距地表4.15~4.45米,厚0.30米,夯土呈灰褐色。由于地下水的影响,夯土较为松软,夯层夯窝

不明显。在金宫城墙底部，铺垫有一层厚约 5 厘米的砖瓦层，砖是东南——西北走向，均为残青砖。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攻下开封，后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号为北京，开封前后做了 10 年的陪都。洪武十一年(1378 年)，朱元璋封其子朱棣为周王，领地开封。翌年在宋金故宫基址上营建了周王府，周王府设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墙。萧墙为周王府的外围城墙，系利用完颜亮的金故宫基址上建造而成。城墙九里十三步，辟有四门，各门极大宽敞，碧瓦朱门，九钉九带。考古发掘发明，座落在金宫基址上的萧墙至今仍保存大部完好，淤埋于地表下 3~5 米深。考古工作者还在 1984 年兴建的开封宋都御街南端的新街口十字路口处，勘探出萧墙正南门——午门遗址。门址东西宽 60 余米，南北 40 余米。由于门址处在闹市区，其详细情况有待于以后的先进工具来勘察。

位于周王府中部的紫禁城是周王的活动中心，系利用宋宫旧基建造而成，周长 2.5 公里。考古勘探测定：今午朝门以北、龙亭大殿后墙以南，包括潘杨两湖在内的区域即紫禁城的范围所在。在对紫禁城北墙东段进行解剖的过程中，发现城墙分为二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是利用宋宫旧基建造而成。

由于开封是著名的古都之一，地下又叠压有“城摞城、城套城”的奇特景观，在当前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如何妥善地保护好地下文物，正确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河南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开封市正式出台了《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于保护古城风貌和地下文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文物工作队大力开展了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勘探工作。勘探过程中发现了众多宋、金、明时期的遗址，从而使考古队在获得大量城下资料的同时，又使城市建设工程避免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文物工作队还发明了利用人力打孔与小型机械钻机相结合独特的考古勘探方式，并利用这一方式基本探明了开封历史上各主要朝代文化层的深度、厚度和多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被有关专家誉为“黄河淤积地区勘探方式上的一大创举”。

回顾过去，开封考古工作从无到有，迄今已走过了 18 年的风雨历程。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在将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只有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重任，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开封城下城那神秘的面纱，终将会在我们手中层层揭开，以展示它那昔日气势非凡的风采。

注释：

①开封地区文管会：《裴李岗遗址 1978 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 年第 3 期。

②郑州大学考古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椅圈马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 年第 3 期。

③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

④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

⑤李合群：《开封地区夏商文化探索》，《开封文博》，1996 年第 1 期。

- 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
- ⑦《史记》之《魏世家》、《秦本纪》、《韩世家》、《高祖本纪》、《曹参世家》等。
- ⑧丘刚:《启(开)封故城的兴废与勘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2期。
- ⑨魏惠王三十一年迁都说(前339年),见《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九年迁都说(前361年),引《竹书纪年》,杨宽《战国史》从之。
- ⑩扩建之说,见《资治通鉴》卷二二六;《旧唐书》卷十二《本纪》。重筑之说,见赵德麟:《候鲭录》。
- ⑪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文物》,1996年第5期。
- ⑫《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
- ⑬《金史·赤盏合喜传》;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宋京城》。
- ⑭《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二六。
- 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宋东京考》卷一。
- ⑯《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一;《长编》卷七十七,大中祥符五年正月。
- ⑰《如梦录》“街市纪第六”;开封宋城考古队:《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开封文博》,1990年第1~2期。
- ⑱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
- ⑲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 ⑳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权智”。

河南尉氏县椅圈马遗址发掘简报

李 钜 陈朝云 匡 瑜 张国硕

丘 刚 许俊萍 王小秋

椅圈马遗址位于河南省尉氏县大营乡椅圈马村东南的台地上，东距县城约15公里。遗址东西200余米，南北100余米，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康沟河支流从遗址北部缓缓流过（图一）。1987年，开封市文管会、尉氏县文物保管所对遗址进行了调查。1992年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现改为考古系）与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尉氏县文物保管所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共开探方24个，揭露面积620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灰坑86个，墓葬49座（包括小孩墓葬14座）。其文化内涵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和少量东周时期遗存。现将前一部分遗存初步整理的结果简报于后。

一、地层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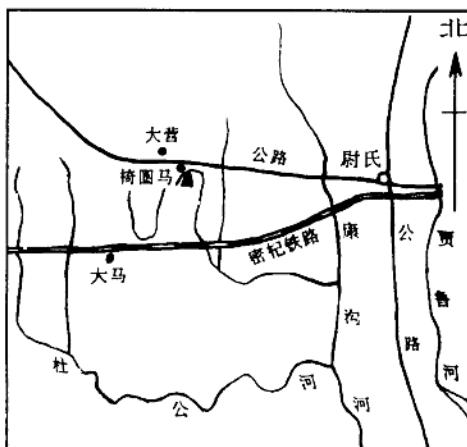
图一 河南尉氏县椅圈马遗址位置示意图(1:4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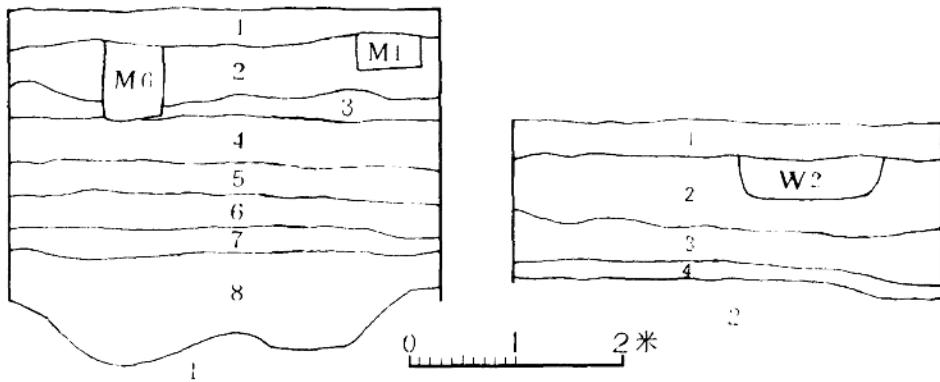
由于70年代平整土地，遗址上层堆积遭到破坏。现存地层堆积除少量东周时期的水井、灰坑等遗存外，均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现分别以探方T0406北壁和T0608东壁剖面为例将地层堆积情况说明如下：

T0406北壁剖面图（图二,1）：

第1层 耕土层。厚0.25米~0.40米。土质松软。包含少量近、现代白瓷片和红陶片。本层下叠压有M1和M6。M1无随葬品。M6随葬有彩陶壶、镂孔豆、钵。两墓直接打破第2层。

第2层 黄灰土。深0.25米~0.40米，厚0.35米~0.60米。质地较硬。内含少量





图二 椅圈马遗址探方地层剖面图

1. T0406 北壁 2. T0608 东壁

红烧土粒和炭粒。出土陶片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少量泥质和夹砂灰陶，器形有釜形鼎、敛口红彩带钵、内折沿罐等。

第3层 浅灰土层。深0.70米~0.90米，厚0.12米~0.35米。土质稍松软。内含较多炭粒和红烧土粒。出土陶片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少量泥质和夹砂灰陶，器形有釜形鼎、罐形鼎、敛口红彩带钵、卷沿鼓腹罐、双耳壶等。

第4层 黄褐土层。深1.05米~1.10米，厚0.40米~0.50米。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红烧土粒和炭粒。出土物与第3层基本相同。

第5层 黄沙土层。深1.50米~1.60米，厚0.28米~0.30米。土质松散。出土物较少。陶器有敞口红彩带钵、折沿鼓腹罐等。

第6层 灰褐土层。深1.75米~1.95米，厚0.25米~0.35米。土质松软，含有较多的炭粒和红烧土粒。出土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器形有敞口红彩带钵、折沿鼓腹罐、圆锥形鼎足、铧等。

第7层 浅黄土层。深2.10米~2.23米，厚0.12米~0.30米。土质较硬，夹杂有水锈斑。出土物较少，器形与第6层基本相同。

第8层 黄土层。深2.30米~2.40米，厚0.34米~1.00米。土质硬，夹杂有大量水锈斑。陶片罕见，器形有敞口红彩带钵。本层下为生土。

T0608东壁剖面(图二,2):

第1层 耕土层。厚0.30米~0.40米。土质松软。含有少量近、现代砖、瓦、瓷碎片和红陶片。本层叠压有W2，葬具为釜形鼎、盆形鼎。W2打破第2层(属工地统一划分的第3层)。

第2层 浅灰土层。深0.30~0.40米，厚0.50~0.70米。土质稍软。陶器有釜形鼎、敛口红彩带钵等。本层叠压第3层(属工地统一划分的第6层)。

第3层 灰褐土层。深0.85米~1.10米，厚0.25米~0.60米。土质较松软。陶器

有敞口红彩带钵、圆锥形鼎足等。本层叠压第4层(属工地统一划分的第7层)。

第4层 浅黄土层。深1.32米~1.60米,厚0.10米~0.20米。土质较硬,夹杂有丰富的水锈斑。陶片罕见。陶器有敞口红彩带钵等。本层下为生土。

根据地层堆积上、下叠压关系的指示和出土器物的差别,暂将本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T0406⑥、⑦、⑧层和T0608③、④层为代表,出土敞口红彩带钵、圆锥形鼎足、折沿鼓腹罐等器形。第二期,以T0406③、④、⑤层和T0608②层等为代表,出土有釜形鼎、敛口钵、卷沿罐等器形。第三期,以T0406②和W2等为代表,出土有釜形鼎、敛口钵、敛口罐等器形。第四期,以M6等为代表,出土有彩陶双耳壶、镂孔豆等器形。现将各期文化遗存简述如下。

二、第一期文化遗存

(一) 遗迹

本期遗迹主要的发现有灰坑。形状有口大底小圆形斜壁圜底形,口、底基本相等的圆形直壁平底形和口、底不规则形三种。其中出土物比较丰富的有H77。

H77位于T0811西南部,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第6层。口大,底小,圆形,斜壁,圜底。口径2.60米,深0.64米。出土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比较少见。器形有口沿饰红彩带敞口平底钵、球形壶、圆锥形鼎足等。

(二) 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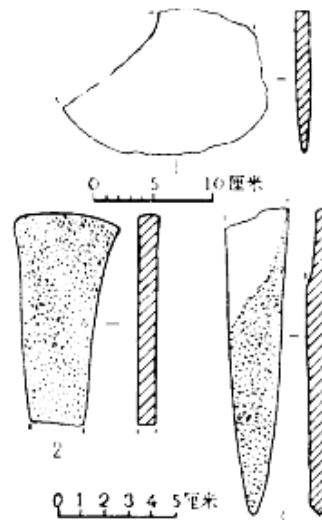
可分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类。

1. 生产工具 比较少见,主要器形有石铲和陶铧。

石铲 皆残。弧刃,通体磨光。标本T0306⑥:1,平肩残,刃部留有使用疤痕,宽17.5厘米,厚1.2厘米,残长12厘米(图三,1)。

陶铧 泥质红陶。楔形,通体用谷类颗粒压印出坑窝。标本T0710⑥:1,尖部残,上部宽4.6厘米,厚0.8厘米,残长8.8厘米(图三,2)。标本T0710⑥:2,上部残,残长13厘米(图三,3)。

2. 生活用具 主要是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中少数为红皮灰胎。有可能是采用窑外渗炭工艺所致。泥质灰陶次之,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夹砂陶所夹的成份经初步观察有云母和蚌壳。具体成份有待科学测试。陶器主要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表面施陶衣磨光,少量器物口沿经慢轮修整。部分器物的口沿单独制作,然后贴接于器身。鼎足也为单独制作,根部插入胎体后磨光加固。除部分钵的口沿饰一周红色或红褐色彩带外,其余器物表面均为素面。器形有钵、碗、球形壶、罐、盆、双耳罐、器座、鼎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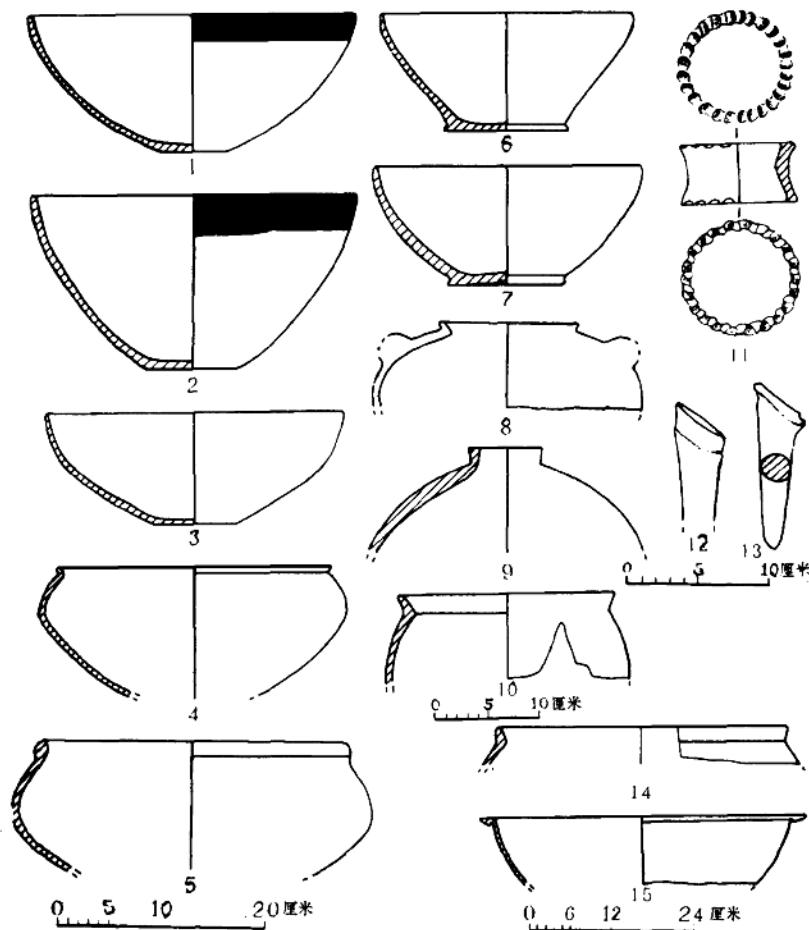


图二 第一期文化石、陶器

1. 石铲(T0306⑥:1)

2.3. 陶铧(T0710⑥:1,2)

钵 以泥质红陶为大宗,少量泥质灰陶,个别呈红皮灰胎。敞口,小平底。标本T0710⑦:1,尖圆唇,浅斜腹,口沿外侧饰一周约3厘米宽的红褐色彩带,底部有在碎植物末上放置所留的印痕,口径31.7厘米,底径6.4厘米,高13.6厘米(图四,1)。标本T0710⑦:2,圆唇,深斜腹,口沿外侧饰一周约4厘米宽的红褐色彩带,口径31.2厘米,底径9.6厘米,高17.4厘米(图四,2;图版一,1)。标本H77:2,尖唇,斜腹微曲,平底,口径28厘米,底径8厘米,高11.2厘米(图四,3)。



图四 第一期文化陶器

1. 钵(T0710⑦:1)
2. 钵(T0710⑦:2)
3. 钵(H77:2)
4. A型盆(H77:3)
5. A型盆(T0605⑥:1)
6. 碗(T0505⑫:1)
7. 碗(T0710⑥:3)
8. 双耳罐(T0305⑥:1)
9. 球形壶(H77:1)
10. 罐(T0406⑧:1)
11. 器座(T0710⑥:4)
- 12、13. 鼎足(H77:5、T0710⑦:4)
14. 罐(T0710⑦:3)
15. B型盆(T0505⑪:1)。